

增强刑事再审裁判文书说理的五个着力点

□ 罗 灿

裁判文书写作大家谈



第八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要求，要做实再审纠错，针对性加强审判监督指导。刑事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裁判的特别救济程序，刑事再审裁判文书是刑事再审程序的集中反映和直观体现，发挥刑事再审程序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权益、加强监督指导、维护法律统一的功能，必须增强释法说理。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八条强调，再审案件裁判文书应当强化释法说理。

刑事再审裁判文书说理与刑事一、二审裁判文书说理，虽有不少的共同点，但有更多的不同点。总体上说，说理的要求更高。增强刑事再审裁判文书说理，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

一、说理策略的差异性

刑事再审结果分为维持原判、改判、发回重审三种，不同的再审结果导致说理策略存在差异。再审改判或者再审发回重审的裁判文书应当进行说理，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再审维持原判，裁判文书也应当进行说理，从而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再审之后无再审”的目标。

再审维持原判的，应当进行补强说理。对于原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无错误的，再审说理主要是对原判决说理进行补充。此种情况下，再审说理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例如，某工程公司、黄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一审认定某工程公司及黄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决某工程公司、黄某无罪。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二审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又提出再审抗诉，再审仍维持原判。再审裁定书说理认为，某工程公司在高速公路便道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地势陡峭、施工难度大等客观因素，在某些路段出现部分土石滑落，造成林地被破坏的后果。某工程公司事后积极采取植被恢复措施，目前被毁林地的植被生长情况良好，已经通过验收，林地用途并未被改变。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某工程公司及黄某存在倾倒土石破坏林地的主观故意，故某工程公司及黄某不构成非法占用

农用地罪。

再审改判或者再审发回重审的，应当进行修正说理。对于原判决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确有错误需要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再审说理主要是对原判决说理进行修正。尤其是再审改判的，更是“推倒重来”。根据《意见》第十条的规定，再审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或者原审不同的，或者认为一审、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应当在查清事实、纠正法律适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说理。

以王力军非法经营案为例。再审判决书说理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原审被告王力军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期间，没有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及工商营业执照买卖玉米的事实清楚，其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国家粮食流通管理有关规定，但尚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程度，不具备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二、说理内容的针对性

刑事再审裁判文书不仅要针对原判是否正确错误进行说理，还要针对检辩双方的争议焦点进行说理。控辩式审理方式要求，作为客观中立的裁判者，再审法官应当围绕检辩双方的争议焦点进行针对性说理。

针对检辩双方在原判过程中就存在的争议焦点进行说理。有的争议焦点在一审、二审过程中就一直存在，控辩双方存在不同认识，甚至一、二审法院也存在不同认识，再审裁判文书需要针对该争议焦点进行说理。

以赵明利诈骗案为例。一审判决赵明利无罪。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二审判决赵明利犯诈骗罪。赵明利妻子提出申诉后，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该案。再审说理认为，赵明利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未实施诈骗行为，原二审判决混淆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对于市场经济中的正常商业纠纷，如果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可以获得司法救济，就应当让当事人双方通过民事诉讼中平等的举证、质证、辩论来实现权利、平衡利益，而不应动用刑罚这一最后的救济手段。上述说理实际上是运用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对于未超出民法调整范畴的经济纠纷，不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

针对检辩双方在再审过程中才形成的争议焦点进行说理。尤其是一旦

出现新证据，就可能推翻原判证据体系，导致再审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不同。在这些案件中，再审说理就需要围绕新的证据进行。

以张高平、张辉强奸案为例。再审过程中，有新的证据证明本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因此，再审判判决书采取“综合评判”方式，先对“关于蒋启智以虚假申请材料骗取银行3200万元票据承兑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进行评判，进行事实认定说理，紧接着再对“关于蒋启智的行为是否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的问题”进行评判，进行法律适用说理，从而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即原审被告蒋启智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票据承兑，但未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原审认定蒋启智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适用法律错误。

三、说理结构的创新性

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包括事实认定说理与法律适用说理。广义的事实认定说理包括证据认定说理和狭义的事实认定说理。根据目前的刑事裁判文书体例结构，事实认定说理一般在“事实与证据”部分，且证据认定说理和狭义的事实认定说理相对独立。法律适用说理一般在“本院认为”部分，与事实认定说理相对较远。如果再审裁判文书说理仍然固守传统的体例结构，那么难免显得冗长，且不易聚焦。因此，有必要创新再审裁判文书说理的结构。

可以考虑将证据认定事实和狭义的事实认定说理有机结合起来。再审判判决书应当避免与一、二审裁判文书在事实和证据部分的不必要重复，简化原审内容介绍。同时，可以采取夹叙夹议方式取代“事实与证据”的叙事方式，避免简单地罗列堆砌证据。近年来，人民法院再审纠正的重大冤错案件大多数是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宣告无罪。在这些案件中，再审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但在案证据并无不同，就需要将事实和证据有机结合起来，运用证据规则进行充分说理。

以聂树斌故意杀人案为例。再审认为原判认定聂树斌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先后从九个方面进行说理，即聂树斌被抓获之时无任何证据或线索指向其与康某被害案存在关联；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0天内证明被害人遇害前后情况的证人证言缺失，严重影响在案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聂树斌所在车间案发当月的考勤表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重要原始书证；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不能确认；原审认定的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原审认定康某死亡时间和死

亡原因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原审案程序存在明显缺陷，严重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

可以考虑将事实认定说理和法律适用说理有机结合起来。再审判判决书可以将事实认定说理与法律适用说理合二为一，成为完整的说理部分，避免重复或者脱节。

例如，蒋启智骗取票据承兑案。再审判判决书采取“综合评判”方式，先对“关于蒋启智以虚假申请材料骗取银行3200万元票据承兑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进行评判，进行事实认定说理，紧接着再对“关于蒋启智的行为是否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的问题”进行评判，进行法律适用说理，从而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即原审被告蒋启智以欺骗手段获取银行票据承兑，但未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也不具备其他严重情节；原审认定蒋启智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适用法律错误。

四、说理对象的独特性

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百五十六条的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重点针对申诉、抗诉和决定再审的理由进行审理。刑事再审程序在引起主体和再审方式上具有特殊性，从而导致其具有独特的说理对象。在引起主体上，虽然刑事再审程序只能由法院和检察院启动，但不少缘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案外人的申诉。对于申诉引发的再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案外人是重要的裁判文书说理对象，其中，案外人尤为特殊。在再审方式上，刑事再审案件可以提审，也可以指令再审。对于指令再审，如果只是简单地出具再审决定书而不对启动再审理由进行说理，那么就没有对下级法院作出具体监督指导，容易导致“一指了之”和程序空转。

针对案外人申诉引发再审的说理。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案外人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侵害其合法权益，可以提出申诉。对于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如果认为生效裁判侵害其合法权益，那么也可以提出申诉。实践中，这里的合法权益往往是财产权益，案外人申诉基本上都是针对涉案财物处置。此种情况下，再审说理主要针对案外人、围绕涉案财物进行。

以韩某某集资诈骗案为例。原审

判决追缴某科技公司及韩某某名下的涉案房屋及其项下土地使用权，某某公司作为案外人提出申诉。再审判判决书认为，涉案房屋及其项下的土地使用权于2012年登记，而韩某某等人的非法集资犯罪发生在2015年之后，故该财产并非使用其非法集资赃款购买；该财产已于2016年11月30日经法院执行裁定交付至郑某某名下，虽然郑某某未将该财产过户，但依据法院生效裁定该财产的权属已发生转移，该财产权益已不属于某科技公司及韩某某所有。

针对指令再审的说理。根据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对于指令再审，上级法院应当制作再审决定书，再审决定书应当针对决定再审的理由即原判的错误所在进行说理，从而为下级法院再审指明方向。

以翟某伟挪用资金罪案为例。再审决定书说理认为，原审被告翟某伟虽然借用了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资金，但其事前征得开发商同意，事后通知并得到所有村委会成员认可，款项用于为村民治病，其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原审认定翟某伟犯挪用资金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五、说理高度的升华性

刑事再审案件往往社会关注度高，因此说理不能仅仅停留在个案本身层面。尤其是对于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说理应当起步于个案而不能止步于个案。根据《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的规定，对于裁判结果有价值引领导向、行为规范意义的案件，法官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切实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规范、评价、教育、引领等功能，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示法律立场。重大案件的再审尤其是再审改判，体现出审判机关对某类行为的裁判标准，裁判文书说理可以宣示人民法院的司法立场。

以杨光毅强奸案（“百香果女孩被害”案）为例。广西高院再审判判决书说理提到，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事关国家未来和民族振兴。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说理认为，严厉惩处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犯罪行为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根

据法律规定及死刑政策，对于罪行不是十分严重的犯罪分子，不得适用死刑，但是，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是我国的国情所在，民愿所向，民意所期。

宣示政策精神。涉企产权冤错案件往往涉及民营企业和企业生产经营不规范行为，对政策精神理解不到位是导致其发生的重要原因。对于再审改判的涉企产权刑事冤错案件，裁判文书说理可以宣示国家依法保护产权的政策要求，引导民营企业和企业规范经营。

以顾维军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案为例。再审判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掷地有声地宣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公司及其经营者必须强化规则意识和诚信意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既是公司运作经营的基础，也是承担风险、偿还债务的基本保证……证券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公司、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遵纪守法，在合法合规中提高竞争力，公司、企业经营者要讲规矩、走正道，在诚信守法中创业、发展。

根据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的数据，2022年，全国法院刑事再审收案3526件，结案3583件；2023年，全国法院刑事再审收案3854件，结案4154件；2024年，全国法院刑事再审收案3113件，结案3241件。审判监督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后一个堡垒，新时代的刑事再审工作必须贯彻落实好第八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办好每一个刑事再审案件，守好刑事审判质量生命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指出，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最重要的“司法产品”，要以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小切口撬动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目标。自觉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纲”和“魂”融入刑事再审工作，增强刑事再审裁判文书说理，是每一名刑事再审法官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和法定义务。找准着力点，撰写更多优秀的刑事再审裁判文书，将为审判工作现代化乃至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 林 森
美术编辑 武凡照
联系电话 (010)67550745
电子邮箱 linmiao@rmfyb.cn

监察法治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 谭宗泽 郭经宇

本质的特征。”监委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是红色法治自革命根据地时期便确立的廉洁奉公精神在当代法治中国的体现。我国红色法治自诞生便将廉洁奉公使命化、具体化并不断丰富，红色根据地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第四项明确规定：“积极负责，廉洁奉公”，因此，我国监察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监察对象既涉及“道德操守”，也涉及“秉公用权”等，彰显廉洁奉公不同于法律要求的治理要求，也是其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内涵的预设目标。

廉洁奉公传承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克己奉公。廉洁奉公之所以能在当代中国取得广泛接受与共同认知，在于中华先贤与仁人志士向来不缺乏对克己奉公的文化推崇，如《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表达中华先贤奉公废私的政治理想，“家因天

下”等价值符号等文化从来不缺乏之舍小为大的文化向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已成为中华某段历史的时代最强音。到了近代后，孙中山先生亲书“天下为公”的匾额悬挂于临时大总统府内。因此，克己奉公的价值标志无疑成为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独特价值标志。

依法履职：对任法去私的传承

监察法治的关键在于行权个体克制私欲而能依法履职。我国监察法第十一条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时，第一项就强调“依法履职”，第二项就规定“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第一项为总体要求，第二项是要求内涵，要求克制的众多列

举情况均为个体私欲的常见类型。监察体制改革及其配套的司法体制改革后我国形成了“一府两院一委”的全新关系格局，其始于监察立案调查，终于法院庭审裁判，检察院在两者衔接运行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监察证据必须符合形式、实质要件而具有合法性，法院主导进行非法证据排除。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系列的监察法律文件、刑事法律文件等进行相关的规则，整个监察体系运行时，监察调查的第一阶段遵从监察法律关系与监察程序，第二阶段的移送审查起诉是监察机关前期工作成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评价而形成监督的法制刚性，第三阶段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需要处于被告人的对方，这三个阶段都需要按照人民法院主导的庭审质证作出最终的法律评价，形成监、检、法的三方法制共性。因

此，监察法治的关键在于行权的个体于各个环节依法履职，震慑处罚公权力可能越轨的私欲。

依法履职接续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任法去私。我国法家学派一直将任法去私当作第一要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曾曰“明主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商君书·修权》），阐释了以法治国需以公正无私为治理之本，所以，也流传下来“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商君书·修权》）的法家名言，这种任法去私在中华法文化的法为天下中得到了典型表述。《管子》所著“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西汉公羊之也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执之”（《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已经形成了任法去私的崇尚风尚。因此，这一底色之上的中华法实际成为促进集体凝聚的重要纽带，各行各业的人民不断凝聚为一个有机团体，中华民族在此

影响下愈加奉献为公而少虑私利，涌现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的兴亡而抛头颅洒热血。

传承并实现超越

当代监察法治中的廉洁奉公与依法履职，对于克己奉公、任法去私的承袭，早已包括并超越了传统文化的本来预设。

监察法治的各种机制设计均能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监察调查的强力与高要求保障了调查的深度与广泛，监察委员会实际上是2018年以后由过去的行政监察、党内纪律检查和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资源集合而成。因此，监察机关凸显封闭性，独立性与政治性，运行比较独特的取证逻辑，表现了更为强大的反腐力度与全方面无死角的反腐范围，尤其是其中对于道德操守的要求，实际上是对未来可能产生腐败的有力预防。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构建中国自主纪检监察学知识体系”（编号：24JDJC03）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分别系西南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